

GUI ZHOU SHENG MIN ZU CHUAN TONG JIE RI JIN RU LU YOU SHI CHANG
DE WEN HUA TIAO JIAN FEN XI

贵州省民族传统节日 进入旅游市场的文化条件分析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贵州教育出版社

GUI ZHOU SHENG MIN ZU CHUAN TONG JIE RI JIN RU LU YOU SHI CHANG
DE WEN HUA TIAO JIAN FEN XI

贵州省民族传统节日 进入旅游市场的文化条件分析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省民族传统节日进入旅游市场的文化条件分析/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650—995—1

I. 贵… II. 贵… III. ①节日—风俗习惯—贵州省
②旅游市场—研究—贵州省 IV. K892.1 F59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7308 号

贵州省民族传统节日进入旅游市场的文化条件分析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A 栋

(电话 0851—8654672 邮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天马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字数 19.75 印张 6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50—995—1/K·28 定价: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二七路 17 号 电话:0851—5666178 邮编:550002

贵州省民族传统节日进入旅游市场的文化条件分析

编 委 会

顾 问：王富玉 吴嘉甫 蒙启良

编委会主任：郝桂华

编委会副主任：刘 晖 李三旗 罗运琪

编委会名单：郝桂华 姚朝雄 柏怀思 黄 平 杨贞杰

刘 晖 徐 飞 吴建民 张开银 李明金

李三旗 罗运琪 杨祖勋 覃绍英 罗廷华

卓玛才让 韦 苇 邓永汉 郑 旭 王德文

主 编：刘 晖 吴建民

副 主 编：邓永汉

执 行 主 编：颜 勇

序

吴嘉甫

—

贵州自古以来就是祖国西南各族系融合与交流的通道和走廊,苗瑶、百越、氐羌、濮僚等族系就在这里进行民族交流与融合,形成了贵州多民族共存的基本格局。千百年来,在这个和睦的多民族大家庭里,各族人民以无穷的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韵味无穷的贵州高原风情画,构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多彩贵州。绚丽多姿的贵州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具有文化基因意义的文化种质资源。在贵州的民族文化中,节日文化恰如盛开在“天然公园”中的一朵朵奇葩,散发出诱人的芬芳,成为贵州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宝贵的旅游资源。贵州17个世居少数民族都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文化内涵的民族传统节日,构成了贵州五彩缤纷的民族多样性的基本格局。

贵州的民族传统节日种类齐全,功能完备。从种类上看有纪年性、祭祀性、纪念性、农事性、社交性等类型;从功能上看,具有娱神、娱人和传承民族文化、模塑民族心理的作用。据统计,在贵州大地上就有500多个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全省各地几乎每一天都有民族传统节日,都有少数民族同胞在过节,“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就是贵州拥有丰富的民族传统节日资源的真实写照。

展示五彩缤纷的服饰文化、展现绚丽多姿的歌舞文化、推广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传承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是贵州民族传统节日的共同功能,也是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共同特征。贵州的每一个民族,都是通过一个个传统节日在传承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生生不息,延绵不断。

二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条形码”。民族传统节日是以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仪式隆重举行的标志性的活动,它是对一个民族的传统生活集中而充分的展现。一方面,当一个民族以节日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传统时,会公开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系统等供人们分享、交流和实践,为人们提供一个互相沟通 and 理解的公共世界,传达出该民族了解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和文化知识,是民族文化的条形码。另一方面,每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都是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凝结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群体精神,构成该族群民众的基本生活方式,彰显着该族群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使该族群的成员个体获得在族群内存活的文化认同感。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认同的“粘合剂”。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的是该民族的文化血脉,通过民族传统节日的周期性的展示、积累、继承和发展,促使该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民族传统节日在增进情感交流、促进民族认同、更新民族观念、统一民族意识、促进民族和谐发展等方面都起着积极而特殊的作用。在多元文化时代,民族传统节日为人们提供

了一个关于民族身份的象征系统,这对于许多已经觉醒的民族在构建“人文伦理观念”和“民族政治观念”上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空间。

民族传统节日是同一族群民族文化认同的“旗帜”。民族传统节日有着显著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心。在同一个日子里举行同样的仪式、过同样的节日,使我们体会到一种属于同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共同的节日习俗使各社会阶层之间产生文化认同感,有利于创造一个更为和谐一致的文化空间。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某一地区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节日的关注,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对“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发展一贯性和持续性的文化需求和“文化认同”。

民族传统节日其实是一种“文化诉求”。在文化多样性特征明显的多民族聚居区,人们关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对内是一个少数民族谋求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贯性和持续性的文化需要,对外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追求“文化承认”的文化诉求。对多民族地区而言,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文化的多样性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空间上的彼此分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文化的发展空间,并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成果”。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体制历史中的多样文化,是文明发展的源泉,不管这种“文化成果”的特质怎样,它都具有人类共享的成分。某一个民族通过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时间段发起的、全体民众参与的、公开的、规范的“民俗活动”——即“节日”来展示这种“文化成果”,供人类共享。这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该民族在社会中追求“文化承认”的一种“文化诉求”。

民族传统节日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强大武器”。民族传统节日在各民族的传承过程中凝结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群体精神,体现该族群民众的基本生活方式,彰显着该族群独具特色的生存方式和知识体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当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以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的时候,当他们的“文化特质”、“群体精神”和“知识系统”为世人所接受、所分享的时候,当他们的“民族文化象征符号”得到弘扬的时候,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便得到空前的增强。毋庸置疑,民族传统节日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强大武器。

民族传统节日为该民族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顺畅的渠道。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都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有许多文化的子系统是抽象的。这些抽象的文化子系统要参与全球化进程,还缺乏适当的渠道。相对于民族文化的完整体系来说,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更具有直观性和更易于被他人所了解、所接受,是他人了解该民族、认识该民族的“窗口”。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有了十分活跃的生存空间,这就为该民族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渠道。

民族传统节日为民族文化参与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建设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文化多元化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多样文化和谐共处,共同实现人类进步的现实环境。建设这个现实环境,实现全球化的文化多样性进程需要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民主机制,需要更民主、更开放、更全面地倾听各种文化的声音和利益诉求,以便把多群体的要求带入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的选择和决策的过程。民族传统节日作为一个族群的精神需求和价值表达的载体,可以参与文化和政治的民主建设;为人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相互理解的平台。人们在欣赏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感受该民族文化的同时,自然也会对该民族的文化权利、生存权利、发展权利更多和更进一步地思考。

民族传统节日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最好载体。五彩缤纷的民族传统节日是贵州绚丽多姿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少数民族来说,“服饰文化”和“歌舞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主要标志。在贵州,每一个民族传统节日都是民族服饰文化争奇斗艳的平台,在“争奇斗艳”的过程中,通过民族民间传统才智评价体系的“激励机制”,推动和促进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使贵州的民族服饰更加绚丽多姿;每一个民族传统节日都是民族歌舞文化发展繁荣的竞技场,在“同场竞技”中,通过民族民间文化的“习得机制”,发展和繁荣了民族民间的歌舞文化,使贵州的歌舞文化更加多彩;每一个民族传统节

日都是民族饮食文化的助推器,在节日期间的交流中,更能够凸显民族民间饮食文化的特色。总之,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服饰文化、歌舞文化、饮食文化的整体展现,通过民族民间的“才智评价体系”的“激励机制”和民族民间文化的“习得机制”的调控,集中展现过程中的个体互动,有效地促进了民族民间文化的整体提高,集中展现了民族文化整体的概貌。

民族传统节日是模塑民族心理的最好平台。民族传统节日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它可以把拥有同一文化传统的所有族群成员聚合到一起,在聚合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形成一致的政治要求,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一个民族的共同的政治要求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模塑过程。民族传统节日是周期性的、循环往复的民俗活动,它为这种“一致的政治要求”提供了一个平台,在循环往复的不断砥砺磨合过程中,这种向心力和认同感越来越强烈,政治要求越来越一致,族群个体的心理素质也越来越趋于一致。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传统节日是模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平台。

民族传统节日是多民族地区文化融合的“催化剂”。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各民族间通过日常交往,文化上相互影响,在“为我所用”的前提下相互吸收,这就是民族文化的自然融合。民族传统节日是周期性的民俗活动,这种活动为多元文化地区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循环往复的渠道,增进了民族间的交往和友谊。通过节日的周期性交流,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有用的文化因子,整合自己原有的文化系统,使自己的民族文化更为优秀、更具活力,这就是民族传统节日促进民族文化自然融合的“催化剂”作用。

民族传统节日是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和谐的润滑剂。民族传统节日是维系民众情感和谐,维系社会和谐的强大精神动力。传统节日作为文化生存的节点,是民众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场景,是民众精神的重要寄托方式。由于多元文化的存在,客观上多了一个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系数,这就要求各民族之间,各民族文化之间,要有沟通、交流和释放的渠道来有效地缓解因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摩擦和震荡,从而缓解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民族关系的紧张。民族传统节日是文化多样性地区各民族交流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年复一年的反复沟通和交流,各民族间文化差异得到很好的填补,文化间差异的“势能”得到缓冲、得到有效的释放,从而有效地缓解了文化差异带来的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摩擦。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传统节日充当了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和谐的润滑剂。

三

同多元文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面临传承危机一样,贵州民族传统节日同样面临着传承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速发展的经济剧烈地冲击着民族传统节日的稳定性和完整性,民族传统节日的传承面临着失传的危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传统的社会圈子被迅速重组,新的人际关系正在形成。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交通、通讯设施的不断完善,少数民族地区过去由于地域和时空的限制而造成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封闭环境被打破,民族传统节日对于本民族群众文化选择的唯一性也被打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传媒的高度发达,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形成了新的多元文化格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成员对文化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传统节日的稳定性受到全面的冲击,传统节日对群众的凝聚力和权威性正在逐渐减弱,传统节日的生存出现了危机,传承的链条出现了断裂的可能。

其次,开放性的社会发展使民族传统节日的民族特点逐渐淡化,有可能使传统节日异化而导致节日的消亡。所谓“开放性的社会发展”是指在一个社区里主流社会(国家机器)与非主流社会(民族民间社团)并存,以主流社会为主导;主流文化(国家机器代表的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并存,以

主流文化为主导的、多元的、有序的、非线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的调控机制是法制。“开放性的社会”的特点是社会分工明晰,管理功能强大,其社会发展呈非线性而有序地发展。“封闭性的社会”的特点是社会分工简单、模糊,社会管理机制不强,社会各行各业呈无序状态,社会发展呈线性状态。在少数民族的“封闭性”的社会里,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完备,族群的“习惯法”可以而且必须调整人们的行为规范,可以规约人们的行为,这是民族传统节日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在“开放性”的社会环境里,在有序和非线性发展的社会发展状态下,族群的“习惯法”已经无法规约族群成员的行为,许多该族群特有的知识和技能也可以游离于节日活动的仪式之外,民族传统节日有可能失去存在的前提条件,成为无本之木。正因为如此,许多关于民族传统节日永久性消失和毁灭的说法绝不是毫无根据的预言。

再次,高速发展的传媒给少数民族社区的人们拷贝了一个精彩的外部世界,阻断了少数民族社区人们学习和掌握传统文化的“神经元”,给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很大冲击。高速发展的传媒特别是影像传媒是一把双刃剑,在为少数民族社区以外的人们拷贝少数民族社区的文化,宣传少数民族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少数民族社区的人们拷贝了外面精彩的世界。因为少数民族文化不是主流文化,不是通俗文化,拷贝和放大的少数民族文化对主流文化形不成大的影响,而外面的世界给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带进来的是主流文化、通俗文化,带给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是巨大的挤压。主流文化、通俗文化大量拷贝到少数民族群众的脑海中,阻断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绝大多数人学习和掌握传统文化的“神经元”,给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进行干预和保护,若干年后许多民族传统节日的消失将成为事实。

四

我们在这里说民族传统节日的传承危机,是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趋势的立场上来说的,是一种趋势的预测,是把民族传统节日当作一个静态的具体事物来分析的。实际上,民族传统节日不是一个静态的事物,它本身也在运动,也在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修正自己运行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天生的“免疫力”在减缓“势能”的冲力,这种趋势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还有政府的行政干预措施,只要这种“干预”机制运用得当,就可以有效地缓解民族传统节日传承危机的风险。

面对民族传统节日传承危机的风险,最佳的缓释预案首先是加大对民族传统节日整体开发的力度,让民族传统节日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传统文化也是他们谋生的手段,进而围绕节日活动形成分工明细、可操作性强的产业链,让民族传统节日和节日文化真正变成他们的主要生计。当民族传统节日真正成为群众的主要生计的时候,他们会自觉地对民族传统节日进行深层次的保护,会从“要我保护”变成“我要保护”。只有当老百姓自觉地形成“我要保护”的观念的时候,才能真正缓释民族传统节日面临的传承危机的风险。其次,要加大“民族文化进课堂”工作的力度,加快“民族文化进课堂”的速度,拓宽“民族文化进课堂”的广度,提升“民族文化进课堂”的深度,把“民族文化”的教育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真正做到“民族文化传播从娃娃抓起”,夯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链接民族文化传统传承缺失的链条,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做起。只有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夯实了基础,我们才可以从根本上缓释民族文化传播危机的风险。再次,要正确发挥“行政干预”的作用,如在一年一度的民族传统节日活动中,可以实行由政府出资,由民间举办各种歌舞比赛和其他民族民间工艺制作比赛,通过各种比赛,培养和“复制”千千万万的“歌舞大师”、“工艺美术大师”等传统文化的传承精英,让民族传统节日真正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前沿阵地。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每一个民族都面临着是“被动固守防线”还是“主动调适寻求发展”的两难选择。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惧怕挑战,逃避挑战,被动固守防线,实行自我封闭,就等于放弃自我调适和寻

求发展;同时,过分的文化固守会导致人类整体文化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和全局性的文化秩序混乱;主动调适寻求发展就有可能带来文化秩序的打乱和重新构建。就贵州的民族传统节日的保护和发展而言,被动固守防线,实行自我封闭是行不通的,但在传承面临危机的情况下盲目寻求不现实的“发展”也是不可取的。依据现状,传承和保护是首要的,传承和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保护完好的传统节日就谈不上民族传统节日的发展。就民族传统节日的传承关系来说,没有有效的保护手段就没有健康的传承机制,没有健康的传承机制就难以保证民族传统节日的有效保护,传承才是根本。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各少数民族健全和完善其民族传统节日的传承机制,保证其传统节日的传承正常进行,这是贵州民族传统节日保护的重中之重。

贵州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全国罕见的,贵州民族传统节日的丰富多彩也是全国罕见的。民族传统节日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同其他民族文化资源一样,民族传统节日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面临着传承的危机,需要各级党政领导和本民族群众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和保护的预案,以保证民族传统节日这一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

2009年1月2日

目 录

贵州民族传统节日综论	1
第一部分 黔东南苗族“姊妹节”	24
一、“姊妹节”综述	24
二、施洞地区“姊妹节”的程序及流变	30
三、施洞“姊妹节”的角色定位	37
四、施洞“姊妹节”的饮食文化	38
五、施洞“姊妹节”的服饰文化	40
六、施洞“姊妹节”的歌舞文化	43
七、施洞“姊妹节”活动的传承和保护	49
八、“姊妹节”活动的文化意义	50
九、施洞“姊妹节”旅游整体开发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52
第二部分 贵阳苗族“四月八”	55
一、贵阳苗族“四月八”的起源	55
二、贵阳苗族“四月八”的节日活动	57
三、贵阳苗族“四月八”与苗族的刺绣蜡染艺术	58
四、贵阳苗族“四月八”与芦笙	61
五、贵阳苗族“四月八”与箫筒	62
六、节日里的歌	63
七、贵阳苗族“四月八”与乌米饭	64
八、苗族“四月八”对苗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作用	65
九、加强宣传,以苗族“四月八”为平台,促进贵阳旅游业的发展	67
第三部分 苗族“花山节”	71
一、有关“花山节”	71
二、“花山节”的起源	72
三、“花山节”的社会功能	73
四、中国最大的苗族“花山节”——水城南开苗族“花山节”	75
五、穿着的历史记忆	77
六、饮食	78
七、高超的芦笙舞蹈	79
八、爱的歌唱	81

九、“花山节”对苗族文化的传承作用	82
十、苗族“花山节”进入旅游市场的条件分析	85
十一、开发南开苗族“花山节”旅游的几点建议	87
第四部分 雷山“苗年”	89
一、综述	89
二、雷山“苗年”的程序及流变	93
三、雷山“苗年”的起源和发展变化	97
四、雷山“苗年”的饮食文化	100
五、雷山“苗年”的服饰文化	102
六、雷山“苗年”的歌舞文化	107
七、“苗年”的文化意义	111
八、“苗年”整体旅游开发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113
第五部分 布依族“六月六”	116
一、综述	116
二、“六月六”的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	120
三、“六月六”的社会功能	121
四、“六月六”的服饰文化	122
五、“六月六”的饮食文化	126
六、“六月六”的歌舞文化	129
七、节日的文学艺术文化	137
八、“六月六”传统节日文化进入旅游市场的条件分析	139
第六部分 侗族“祭萨节”	142
一、萨与萨神崇拜	142
二、侗族地区祭萨活动概述	147
三、代表性村寨的祭萨活动	149
四、“祭萨节”的文化意蕴	160
五、“祭萨节”的资源价值	161
六、“祭萨节”进入旅游市场的可行性分析	164
七、开发“祭萨节”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66
第七部分 水族“端节”	168
一、“端节”文化概述	169
二、“端节”对水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作用	179
三、“端节”进入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条件分析	180
第八部分 黔西北彝族“火把节”	189
一、“火把节”中的民俗活动	190
二、“火把节”中的饮食	194

三、“火把节”的服饰·····	197
四、彝族的火崇拜·····	197
五、“火把节”与彝族的岁时历法·····	199
六、“火把节”的民间传说·····	201
七、一次别开生面的“火把节”·····	201
八、“火把节”在贵州西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的可行性分析·····	203
第九部分 仡佬族“吃新节” ·····	208
一、仡佬族“吃新节”的来历·····	208
二、仡佬族“吃新节”的覆盖范围·····	209
三、仡佬族“吃新节”的活动时间·····	209
四、仡佬族“吃新节”的特征及流变·····	210
五、仡佬族“吃新节”的功能与价值·····	210
六、仡佬族“吃新节”的程序·····	212
七、仡佬族“吃新节”的祭祀活动·····	214
八、仡佬族“吃新节”的服饰文化·····	216
九、仡佬族“吃新节”的饮食文化·····	216
十、仡佬族“吃新节”的戏曲音乐文化·····	217
十一、仡佬族“吃新节”的文学艺术文化·····	218
十二、仡佬族“吃新节”的传统体育文化·····	222
十三、仡佬族“吃新节”对仡佬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作用分析·····	223
十四、仡佬族“吃新节”进入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条件分析·····	224
第十部分 瑶族“盘王节” ·····	227
一、总述贵州瑶族“盘王节”·····	227
二、塔石瑶族“盘王节”的演变及其特征·····	232
三、塔石瑶族“盘王节”的程序·····	235
四、塔石瑶族“盘王节”的文化内涵·····	238
五、瑶族“盘王节”的整体开发与局部开发分析·····	245
第十一部分 土家族“摆手节” ·····	249
一、综述·····	249
二、土家族“摆手舞”的起源、内容、过程及流变·····	249
三、土家族“摆手节”与土家族服饰、饮食、歌舞、音乐、工艺美术等民间文化·····	250
四、土家族“摆手节”的特征和社会功能与价值·····	266
五、土家族“摆手节”进入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条件分析·····	269
贵州民族传统节日概览 ·····	272
一、苗族传统节日·····	272
二、布依族民间传统节日·····	279
三、侗族民间传统节日·····	282

四、土家族民间传统节日	289
五、彝族民间传统节日	290
六、仡佬族民间传统节日	291
七、水族民间传统节日	293
八、回族民间传统节日	295
九、白族民间传统节日	296
十、瑶族民间传统节日	297
十一、壮族民间传统节日	299
十二、畲族民间传统节日	300
十三、毛南族民间传统节日	301
十四、蒙古族传统节日	302
十五、仡佬族民间传统节日	302
十六、羌族民间传统节日	303
后 记	305

贵州民族传统节日综论

一、概 述

(一) 贵州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概貌

贵州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地处东经 $103^{\circ}36'$ ~ $109^{\circ}35'$,北纬 $24^{\circ}37'$ ~ $29^{\circ}13'$ 之间,东西宽 510 公里,南北长 570 公里,总面积约 17.6 万平方公里,是一个隆起于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之间的岩溶山原,通称贵州高原,其平均海拔 1107 米,地势由西向东呈三级阶梯状倾斜。贵州省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及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市和毕节、铜仁地区,87 个县(市、区、特区)。在贵州约 17.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97% 的面积为山地与丘陵,其中 73% 为岩溶地貌,溶洞极多。乌蒙山脉、大娄山脉、武陵山脉、苗岭山脉纵横于贵州全境。南北盘江、红水河、乌江、湄阳河、清水江、都柳江等珠江、长江水系的支流奔流于万山丛中。贵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境内山峦起伏,地貌类型复杂,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分明,适宜于多种动植物生长,也适宜于人类生存繁衍。在全省范围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每一地区内高山深谷落差大,导致各地在同一季节、同一时间内西北和东南、山上与山下的温差较大,出现“十里不同天”的现象。由于贵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特有的地形地貌,使贵州高原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古代各民族交汇的大走廊和各民族的集结地,形成了我国民族血统最多元的省份之一。华夏族系、氏羌族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的诸民族及蒙古、回、满、藏等民族因不同原因在不同时期从不同方向进入贵州,与原住民之濮人相交汇,在共同开发贵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贵州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

(二) 贵州少数民族基本概况

1.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现有民族 49 个,除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蒙古族、佤族、满族、羌族为贵州的世居民族外,其他少数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工作调动、工作分配、复员转业安置、从事商贩等来黔定居的。据 2005 年 11 月 1 日贵州省 1% 人口抽样调查统计,贵州省常住人口为 3725 万,其中,汉族人口为 2273 万,占贵州总人口的 61.02%;少数民族人口为 1452 万,占贵州总人口的 38.98%,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居全国第 3 位。贵州是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和水族的最大聚居区。在贵州的世居民族中,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水族人口分别占全国同一民族总人口的 48% ~ 98%。

2. 贵州少数民族分布的特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贵州民族分布呈现出汉族分布在城镇及交通沿线附近、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农村及远离交通沿线的边远山区的特征。苗族、瑶族、彝族主要居住在山上,仡佬族多居住于山谷,布依族、侗

族、水族等大部分傍水而居。“高山彝苗水仲家(布依族旧称),仡佬住在石旮晃”;“苗家住山头,夷家(指布依族)住水头,客家(少数民族对汉族的称呼)住街头”等民间俗语就是对贵州民族主体分布格局的生动概括。汉族和苗族是贵州分布最广的两个民族,全省各地都有分布。汉族集中居住在黔中、黔北、黔西北;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黔南、黔西南、黔西北和黔东北;布依族主要分布在黔南、黔西南、黔中;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和黔东地区;土家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北和黔北;彝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北和黔西南;仡佬族主要分布在黔北、黔西北和黔中;水族主要分布在黔南;回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北、黔西南和黔中;白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北;瑶族和壮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黔南;畲族分布在黔东南和黔南部分县、市;毛南族分布在黔南部分县内;满族、蒙古族分布在黔西北部分县内;羌族分布在黔东北的石阡、江口两县境内。

3. 世居民族创造了贵州的历史

世居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创造了贵州的历史,推动着贵州社会历史的发展。战国至秦汉时期,以濮人为主体的创建了以夜郎为首的且兰、漏卧、句町等若干民族地方政权。《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汉武帝一方面承认这些邦国存在的客观实际,分别封之为王为侯,一方面将其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辖之下,设置犍为郡,嗣从犍为郡地划出夜郎及其旁国地置牂牁郡,下就各邦国地各设一县,贵州历史上开始了郡国并存的局面。西汉末年,夜郎王、句町王和漏卧侯等为争夺土地举兵相攻,不听中央王朝调解,夜郎王尤为不恭,王朝遂将其杀灭,其余诸小国亦渐不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局长期处于鼎立、对峙的动荡局面,郡县设置多有变动,郡县所属亦常有变更,郡县形同虚设,地方政局为兴起的汉族“大姓”与少数民族“夷帅”所左右。

唐宋时期,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分别出现于黔西北、黔中、黔西南。为加强对贵州的统治,从唐宋起,中央王朝改地方行政机构郡县制为州县制。州分经制州、羁縻州两类。经制州主要设于内地汉族较多的地区,由朝廷派官员统一治理;羁縻州亦称边州,设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朝廷委任该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官依其各自习俗统治。贵州的经制州有思州、黔州、费州、播州等十余州。乌江以南所设主要是矩州、蛮州、明州、宝州、抚水州等数十个羁縻州。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在贵州实行土官与流官并治及执行“改土归流”。贵州在元代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元王朝在贵州设都元帅府实行军事控制,置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委任官吏管理地方,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委任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蛮夷长官司等不同等级的土司。明王朝于贵州交通要道沿线广设卫所,驻军屯戍兼领辖区民政,在沿袭元代土司制基础上更使其制度化。土司分为文职和武职两类,土府、土州、土县丞为文职,属于吏部;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为武职,属于兵部。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思州、思南两宣慰使为争“沙坑”而相互攻杀,朝廷派员调解,“皆拒命不致”。遂派大军压境,将其押京处理,并废其土司,以其地分置思州、思南、石阡、铜仁、镇远、黎平、新化、乌罗八府,委派流官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省级地方行政机构——贵州布政使司。此后,明清两代“改土归流”日渐深入,土司势力日益衰败,府、州、县日渐增多。中央王朝推行“改土归流”,实质上是以封建地主制取代封建领主制,用中央集权取代地方分权,促使贵州社会历史前进了一个阶段,巩固了国家政治的统一。无论郡国制,经制州、羁縻州制,府、州、县制和土司制都是国家制度认可的政治制度,都是中央王朝为了国家统一并结合民族地区实际而施行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将府、厅、州一律改为县,实行省、县两级地方行政管理。1935年以前的贵州处于军阀混战、军阀统治时期。国民政府消除地方军阀势力后,贵州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之下。民国年间虽有极少数土司存在,但皆名存实亡,已无任何政治经济实力,只在黔西北和黔西南部地区有一批小土目、亭目对其辖区少数民族的统治还保留着较浓厚的领主制残余。

4. 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早在汉武帝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贵州设置郡县,派驻官兵,并“募豪民田南夷”,龙、傅、尹、董等“三蜀”大姓率属众落籍牂牁郡。以后历代王朝,内地汉族人口多以官、军、民身份不断进入贵州。明代以

“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形式在贵州实行“军屯”和“民屯”，大批江南人口被指令集团性地移入贵州屯垦，其中仅卫所官兵即达20余万之众。清代“改土归流”的普遍推行和府、厅、州、县的广泛建立以及封建地主制的全面确立，使周边及内地汉族入黔谋生的人数大大增加。抗日战争期间，大片国土沦陷，西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中原及东南沿海的人口大量“逃难”涌入贵州。

汉族人口以不同原因、不同形式，不断地、越来越多地移入贵州高原，给贵州增添了大量劳动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知识和技术。他们和贵州少数民族人民一起开发贵州，共同推动着贵州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贵州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农业，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早在夜郎时期就已“耕田，有邑聚”。赫章可乐少数民族墓葬中，出土有夜郎时期的铜锄和铁质的铲、锹、铤。平坝汉墓中有西汉时期的铁锚、铁锹，还有鸡、狗、兔、牛等陶模。兴义汉墓出土有东汉时期的粮仓、水田陶模。《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当夜郎王兴被诛杀后，与之交战的漏卧、句町“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随着人口的繁衍，民族地区的生产不断发展。明代初年，水西岁向官府输粮8万石，乌撒岁输2万石，古州岁输近9千石。屯军、屯民开垦出大量屯田，至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贵州20个卫所开垦屯田即达6336.5公顷。在汉族军民的带动和影响下，牛耕及水车、龙骨车、塘、堰等在贵州得以推广，明清两代贵州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较大的发展。为了政治、军事所需，明王朝于贵州广开驿道、普设驿站，以贵阳为中心的东西南北交通网初步形成，贵州的交通运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改土归流”的不断深入，府、州、县越来越多的设置，各地原有的军事重地——卫和兴起的政治中心——府、州、县的治所逐渐形成城市，分别成为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便于城乡山区和坝地的物资交流，明代以十二生肖命名定期的集场于省内各州、县设立，清代则更为广泛。农业生产的发展，驿站的开设，城镇的兴起，促进了手工业、商业和集市贸易的发展，城乡联系密切，各族交往频繁，贵州的经济社会呈现出逐渐繁荣之势。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扩大了省内各族人民对棉花、布匹、食盐及日用百货的需求，扩大了朱砂、水银、铅、锌、桐油、乌柏（椿子）、五倍子、漆等土特产在省外的知名度。内地各省商贩往往不远千里沿陆路、水道根据所需分别运进售出，通过货物转销而获利。大批的外省行商坐贾云集各城市、码头，按籍贯就地建立江西、湖南、两广、四川、云南、陕西、福建等会馆以行互助和维护同乡权益。但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边远山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仍长期处于畲山为田、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与商贸无缘、原始单一的社会经济阶段。从总体上看，山地农业、山区经济是贵州社会经济的一大特色。

（三）贵州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1. 贵州多元文化的形成

贵州民族血统的多元化决定了贵州民族文化的多元化。贵州山多、山高、洞穴多、地形多变、地貌复杂、温和湿润的自然环境，五大古族系长期交往、结集的社会历史背景，形成了贵州民族文化发展的深邃时空，铸就了贵州民族文化诸多的特色和深厚的底蕴。在这里，山川的强烈切割和纵横交错的自然环境虽不便于交通，但客观上却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以及与内地联系的日趋加强，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变异。贵州民族文化就在这种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静”与“动”之中和谐而有序地发展着，自然而自觉地融合着、变化着，形成了贵州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

2. 贵州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

贵州民族文化既有突出的个性，又有着明显的共性。“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是贵州民族文化的首要特征。从总体上看，贵州的民族文化仍然属于以家庭为单元、以血缘为纽带、以民族为标志、以社区为范围、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山地农耕文化，但由于各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决定了各民族

聚居区的文化主导地位,使贵州的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局面。但各民族文化之间和睦相处,相得益彰,又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现象。

从服饰上看,在清代中叶以前,贵州各民族服饰区别井然,成为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内不同支系个性的外在标志。许多民族服饰的个性色彩都已汉化。传统的民族服饰仍普遍传承至今的有苗族、瑶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畲族和汉族中的“屯堡人”。苗族支系特多,故其服装的款式最繁,约有一百余种,堪居全国各族首位。安顺、平坝、镇宁、长顺一带明代屯军的后裔“屯堡人”妇女服饰沿袭数百年前江南民间服装式样,在整个汉族族系中实属罕见。从居住特点上看,楼下圈养牲畜、存放杂物,楼上住人的古代“干栏”式房屋,在布依族、侗族、水族及部分苗族、仡佬族聚居区仍可看到;黔中地区以石头砌墙、石板盖顶的石板房,在布依族、仡佬族、苗族和屯堡村落中则比比皆是。从婚姻习俗上看,许多少数民族婚姻的缔结多以节日集会男女集体交往的方式自由恋爱为前提,再依提亲、定亲、接亲等程序完成,体现了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各民族联姻的范围多局限在同一民族内部的同一支系中,姑表亲的现象比较普遍。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近亲婚配的传统日渐淡化,比重在迅速减少,这是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标志。从丧葬习俗上看,各民族丧事隆重而肃穆,礼仪繁杂而又各有不同,其中“指路”是用鸡指引“亡灵”回归祖宗生活过的原地与先祖团聚,通过“亡灵”回归所经途程可知该民族或该支系迁入贵州的线路。从节日上看,有仡佬族的“祭山”、“吃新”,瑶族的“祭盘王”,侗族的“祭萨”,水族的“过端”、“过卯”,彝族的“火把节”,布依族的“三月三”、“六月六”,苗族的“苗年”、“吃牯脏”、“吃新”、“吃姊妹饭”、“跳花山”、“四月八”等等。这些民族节日风情浓郁,文化内涵丰富,除了秉承各民族的传统以外,还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从民间传统的社会管理和道德观上看,各族民间的族长、寨老、“议榔”、“议款”制度以及尊老爱幼、团结互助、扶危济困、修桥补路等道德取向,在历史上对村寨、社区的秩序稳定与社会发展起着广泛、有效的协调、规范和维护作用,今天仍可适当地利用其传统的社会功能作为民族地区建设和谐社会的补充。

贵州民族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自然融合,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贵州民族文化的这个特征,主要表现为各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各自的民族特色,同时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吸纳汉文化的营养成分,主动地整合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在世居民族中,除土家族、回族、蒙古族、羌族等民族以汉语为第一交际语言外,贵州的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第一交际语为本民族语,但其大多数人能同时使用汉语。土家、仡佬、回、白、毛南、仡佬、满、蒙古、羌等民族男女服饰与汉族基本相同,苗、布依、侗、水、畲等民族一部分男子服饰与汉族相同。少数民族婚丧仪规各有特色,但都掺有汉族婚礼中纳彩、问名、纳吉、请期、迎亲及“回喜神”等婚俗;汉族丧事中烧倒头纸、沐浴、开路、封棺、出殡、丢“买路钱”、土葬、立碑等仪式,除回族以外的若干少数民族也有所采用。汉族最为隆重的节日为过年,以农历腊月三十至正月十五为期,各少数民族亦有此习俗。不同之处在于苗族、侗族、彝族、水族等民族还兼过该族原有的以九月、十月、十一月为岁首之年。明代从内地进入贵州的汉族军民带来的春节期间跳地戏、唱花灯等娱乐活动,也在布依族、土家族、仡佬族中流行。

汉文化影响深广的主要原因,一是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重视学校教育,普遍明令建卫、府、州、县学等官学及倡办民办官助的社学,乡绅捐办义学及民间兴办私塾。各级各类学校都以儒家礼教为核心,以教化为目的,使儒家礼教在少数民族的上层及民间逐渐得以推行。二是大量的汉族军民进入贵州以后,以城市为点、以驿道为线不断地在面上扩散,长时期、大范围地与各少数民族杂处错居,在生产、生活中广泛而密切地接触、交流,汉族的习俗、礼规为各少数民族有选择地仿效、吸取,经过整合,成为各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3. 贵州民族文化的发展趋势

贵州的历史,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一个典型印证。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都各有特色,具有鲜明个性。民族众多,民族文化特点鲜明、个性突出,是形成贵州民族文化差异性即文化多样性的基